

引 言

公元前 5 世纪，当齐鲁文化的先驱、中国古代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率领弟子们驾着牛车在神州大地上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古代印度，另一位人类的圣哲也在云游四方，从事普渡众生的事业，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相传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一位国王的儿子，但他并不留恋高贵的王子地位和舒适的宫廷生活，决心“出家”以求得大彻大悟，走上了普渡众生的修行之路，从而创立了世界上三大古老宗教之一的佛教。

公元前 3 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推行佛教，佛教开始步出印度，传向世界。随着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友好往来，佛教思想也逐渐传向中国。东汉永平七年，时值公元 64 年，汉明帝刘庄派了 12 人组成的汉朝使团到西域取经。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取得了佛经、佛像，并邀请印度高僧竺法兰、摄摩腾一道，于公元 67 年回到当时的东汉京城洛阳。为了安置两位印度僧人，并为他们提供礼

佛、译经和传法的场所，汉明帝下诏，在洛阳雍门外的御道旁，修建一座供二位贵客专用的建筑。当时朝廷接待外宾的官署叫鸿胪寺，汉朝使臣取得的佛经又是白马驮回的，于是这座建筑就被定名为白马寺。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庙。

一般地说，印度佛教传入我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从印度经中亚，再经过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大乘佛教（也称北传佛教）；一是从印度自海上传入我国云南傣族的小乘佛教（也称为南传佛教）；一是从印度和内地传入西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俗称为“喇嘛教”。

从印度经中亚，再经过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佛教，主要流行于汉族聚居区，人称北传佛教，也称为汉地佛教或汉传佛教，在我国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山东地区的佛教主要就是汉传佛教。

大约公元 7 世纪，佛教也从印度通过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这条途径传入我国的佛教，人称南传佛教，也称小乘教、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流行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自治州和保山、临沧等地。信奉者多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群众。

公元 7 世纪中叶，唐代文成公主嫁往西藏，与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结婚，文成公主带去了汉传佛教。同时，松赞干布又与尼泊尔的公主尺尊结婚，尺

尊带去了印度佛教。一百年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又从印度请来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又将印度佛教中的密宗带到西藏。这样，汉传佛教、印度佛教与西藏本地原有的宗教相结合，便产生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藏语系佛教，主要流行于藏族、蒙古族聚居区。

与从上述三条路线传入我国的佛教相适应，我国的佛教寺庙也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为汉传佛教寺院，数量多，分布广。第二类为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西藏、内蒙古自治区以及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省。第三类为南传佛教寺庙，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

从修建白马寺到今天，我国佛教寺庙的建筑历史已经将近两千年。在此期间，佛教流传越来越广，寺庙也越来越多。虽然经过战火、自然灾害和灭佛等种种因素，有的寺庙灰飞烟灭，有的寺庙屡毁屡建，但新的寺庙也在不断出现，历代都保存有众多的寺庙。据记载，北魏时期，仅洛阳一地就有佛教寺庙 1367 座。南北朝时期，虽然战火频繁，但寺庙依然有增无减，唐人杜牧有这样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尤其兴盛，寺庙也当然更多。以后，宋、元、明、清诸代皇帝，大多推崇佛教，敕命修建的佛教寺庙层出不穷，民间修建的寺庙更是难以计数。由于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因

素，许多寺庙被损坏以至湮灭了，但留存至今的仍然很多。

在佛教西来东渐的近两千年时间里，山东与全国一样，佛教越传越广，寺庙也越来越多。

西汉平帝元始四年，也就是公元 4 年，四川人王净到青州云游说经，寄住在今天临朐县境内沂山上的泰山祠。不久之后，西汉外戚王莽篡夺政权，战火蔓延开来，社会动荡不安，王净和弟子们隐居在沂山。到了汉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朝，社会渐渐稳定，王净的弟子们才重新出山活动，到附近各县宣教说经，广收信众，教徒日增。山东地区佛教寺院的兴建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东汉明帝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 58 年，敕建虹蜺山（白龙山）虹梁寺（宋改称寿圣寺）。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 67 年，在潍城旧县署的东北部敕建观法寺。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净的大弟子观法于沂山中心的玉皇顶下、圣水泉畔设立发云寺，后来更名为法云寺。

魏晋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百姓的生命时时处处都可能受到威胁，更容易接受佛教的“彼岸世界”的宣传，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崂山崇佛寺建于魏元帝景元五年即公元 264 年，是佛教在崂山的发端之地。西晋惠帝太安年间（302—304）青州兴建宁福寺。西晋王朝走下坡路的时候，皇帝要迁往江南避乱，临沂的王公贵族也随着南迁，

就将府宅捐给僧人，改为寺院。东晋初年，沂山法云寺僧众 40，乡间百姓皈依佛祖的人数以万计，慕名求拜者一天多于一天，遂于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在沂山东麓法云寺下、汶水之源兴建大寺，题额“明道寺”。东晋永和七年（351），前秦僧朗在泰山北麓之昆瑞山（位于今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创立佛寺，后人称朗公寺，传经布教，很快发展到“上下诸院十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东晋安帝义熙八年（412），高僧法显在印度取经 15 年，游历三十余国，抄写了数百万字的佛经，由海上搭船归来，因航行中遇大风，漂流到当时归青州管辖的崂山登陆，受到太守李嶷的热情接待，居留一年之久，对当地佛教的传播和经典的研究发生了极大影响。

南北朝时期，山东佛教初盛，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相结合，一些富有民族色彩的寺院相继建立。刘宋时期（420—479）宾国（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附近）王子求那跋摩僧，在泰山创建衍草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魏太武帝的禁佛政策，使泰山佛寺损失严重。文成帝继位后，重新崇佛，泰山佛教迅速得到恢复。北魏正光年间（520—525），高僧法定在泰山西北麓的方山北部创建了神宝寺，后迁方山南麓建灵岩寺，被誉为灵岩寺“开山第一祖”。北魏时泰山北麓建有谷山玉泉寺，徂徕山东南麓建有光华寺。魏太武帝灭佛时期，青州一带属南

朝刘宋版图，佛教幸免于难，寺院有增无减。著名的有建于北魏正始五年（508）的青州黄楼兴国寺，北魏孝昌二年（526）的青州城北吉祥寺，建于北魏永安三年（530）的青州南柳镇石佛寺、北魏永熙年间（532—534）的青州东夏镇延祥寺等。沂山以明道寺为核心，相继建有白玉庵、柳泉寺、朝阳寺等，并在其周围山中建立寺院多处，较著名的有石门山石门寺、仰天山白云寺、嵩山白茅寺、玲珑山凌云寺、孤山悬泉寺、盘阳洪福寺等。莒县浮来山定林寺，就始建于南北朝。《莒县志》载：定林即刘勰（南朝梁著名文学批评家）校佛经、昙观（奉敕）送舍利处。

南北朝时期山东各地兴建的寺院，较著名的还有淄川普照寺（北齐）、临淄龙泉寺（北齐至北周）、广饶皆公寺（北魏）、惠民资福寺（东魏）、博兴兴国寺（东魏）和般若寺（北魏）、济宁齐梁古刹普照寺和铁塔寺（北齐）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宣传“空”为中心的般若思想与玄学思想相结合，形成般若学，成为中国佛教的基础理论，山东佛教深受影响。现存泰山经石峪的北齐隶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空宗的主要经典。泰山一带的光华寺和映佛岩两处石刻般若经，汶上县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都是南北朝时期山东佛教刻经的代表作。

隋唐年间，山东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泰山一带成

为山东佛教文化中心，相继创建了藏佛寺、资福寺、法化寺、竹林寺、天封寺等 20 多处佛寺。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重视文治政策，扶植佛教传播。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诏令以泰山朗公寺扩建为神通寺。建于大业七年（611）的历城四门塔，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单层石塔。唐贞观十九年（645），著名高僧玄奘到灵岩寺译写经文。唐麟德二年（665），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到泰山封禅时，打破以往惯例，先到灵岩拜佛，后至岱顶祭天。武则天曾诏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前”。开元年间（713—741），禅宗北派降魔禅师在灵岩寺讲法，大兴禅宗。隋唐年间泰山一带所建寺院、佛塔和石窟造像，至今仍有大量遗存。

唐天授元年（690）七月，僧人法明编著《大云经》献给武则天，称武则天是西天弥勒佛下凡，应取代李唐王朝做天下主。武则天当即下令刻印颁布《大云经》，诏令全国各州建“大云寺”。山东青州云门山大云寺等多处以“大云寺”命名的寺院都是这种情况下奉诏兴建的。

唐朝前期倡佛护僧，全国兴建大批佛寺，进一步扩大了寺院庄园的规模，侵占了许多耕地，因而加重了国家负担，影响了财政收入。僧侣猛增，扩大了寄生群体，僧伽腐败，对僧众管理不善，成为社会问题。至唐武宗时酿成了大规模的毁佛运动，史称“会

昌法难”。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毁寺。据《资治通鉴》载：七月，敕令东西两都两街各留一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五人，其余僧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还俗，寺非应留者毁撤，田产没官，铜像、钟磬铸钱，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这次毁佛运动中，沂山除保留古刹法云寺外，皆摧毁荡平，荣成赤山法华院等许多寺院均遭毁坏。“会昌法难”中，因当时藩镇权势已重，也有些地方并未遵旨禁佛。武宗死后，宣宗又重新尊崇佛法，创建寺刹，山东佛教依然向前发展。

五代时期朝代更迭，战争频仍，无暇顾及僧尼管理，寺僧发展泛滥直接影响国家的赋税和兵役。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诏令整饬寺院，凡无敕颁寺额之寺庙一律停废，严禁百姓私自出家，将铜铸佛像改铸钱币。据雍正八年潍县知县秦伯龙所立《重修石佛寺碑记》载：“显德中，诏毁天下铜像铸钱，存者惟石佛，故寺以石佛名也”。

金代时期，各地寺院兴建依然不衰。泰山有“敕建”或“奉敕”明确寺产的寺院有40多处，金章宗完颜景赠额玉泉寺为“玉泉禅院”、“香严禅院”西麓竹林寺在元贞年间（1295—1297）名声大振，影响极大，东到齐鲁、北抵幽燕、西逾赵魏、南到黄河这

样广泛区域的人们，“莫不闻风趋赴，其送施者朝暮不绝”。青州一带，金大定年间（1161—1189）建有寺院 10 座，元朝至元年（1264）到至正十三年（1353）先后兴建和重修寺院 35 座。金元之际，烟台地区有佛教寺院 22 处。

明朝，山东佛教仍盛。青州城内“益之寺观，较房舍十之二”。明衡王分封青州后，喜佛尊经，亲自主持修建佛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竣工的五莲山万寿护国光明寺，是一座由皇帝赐名、内库直接拨款、太监亲自监工的御建寺院。此寺最兴盛时期有僧人 300 多名，寺田千亩全部免征田赋。天后年间有西域僧闻名而来，留有七片贝叶经。明宣德三年（1428），高丽僧满空登泰山，先后在竹林寺、普照寺住持二十多年，并为高丽翻译大批佛经。明嘉靖年间《山东通志》记载明初以来山东兴建和重修的著名佛寺 152 座。

明代道教式微，山东许多道教场所被僧人占用。王重阳创修的嵯山全真洞内，被雕刻石佛像千尊，俗称“千佛洞”。

清朝统治者崇奉佛教，沿袭明制，逐级由僧录、僧纲、僧正、僧会掌管僧尼事务，一直到清朝灭亡才废止。雍正年间，在青州城北满州营内建普恩寺并赐匾额。清乾隆幼年时因常生疾病，在光明寺许愿出家，光明寺遂大兴土木，五莲山一带建有大小寺庙四

十多座。宣统年间《山东通志》记载全省寺院 377 座，其中，长清灵岩寺、益都法庆寺、诸城佉云寺和五莲光明寺，并称山东四大禅寺。

清代山东民间佛事活动普遍，成为民风民俗的组成部分。济南有“五里一庵，十里一寺”之说，村村有庙。泰山一带，佛教则明显衰弱。泰山尊崇碧霞元君极盛，清代几乎未修建一座佛教寺庙。

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拆除佛像，摧毁寺庙。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山东佛教衰落下来。

辛亥革命以后，因战乱各地寺庙损坏严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和没收佛寺财产兴办学校的政策，把一些寺庙改为学校。对此，佛教界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并出现了以居士为中心的佛教组织，发起了“佛教复兴运动”。1914 年，济南成立了佛教教育团体“佛学社”、研究佛学的团体“济南佛学社阅经处”和修养团体“济南女子莲社”。1928 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后，佛教界即在济南成立了山东省佛教会。泰安、东平、福山、牟平、栖霞等县，也相继成立了佛教会，管理僧尼和保护寺庙财产。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居士团体，以济南崇实佛学会、青岛佛学会和佛学研究会、德州现代佛学社比较著名。济宁、金乡、邹县、微山等县成立了居士林。

20 世纪 30 年代青岛湛山寺的兴建，使佛教在山东东部沿海城市有所发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山东各地许多寺庙被日军破坏或被国民党军队占据，或被拆除修筑工事，或被炸毁。也有些寺庙因年久失修而废弃。

建国初期，经过民主改革、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废除了佛教内部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禁止抽签算卦、拴娃娃等迷信活动，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佛教徒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劳动光荣、自食其力的号召下，寺庙僧尼贯彻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工作，生活上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为普及文化教育，各地大多借用寺庙兴办学校，有些较大的寺庙由机关和街道群众团体使用。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寺庙被改作他用，一部分确有文物价值和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寺庙继续保留。1965 年全省有寺庙 152 座，僧尼 463 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佛教活动被迫停止。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佛教活动逐步恢复。1983 年，济南千佛山兴国禅寺和青岛湛山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

寺庙，经过政府拨款维修，先后于 1985 年 1 月和 1986 年 12 月作为佛教活动场所正式开放。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离寺的僧尼陆续返回寺庙。1990 年全省开放寺庙九处，即济南千佛山兴国禅寺、青岛湛山寺、荣成赤山法华院、泰山斗母宫和普照寺、五莲山光明寺、枣庄青檀寺、临清普善寺和大宁寺，共有僧尼 70 人，居士数千人。

总而言之，齐鲁佛教寺庙作为佛教在山东地区发展和传播的见证，走过了一条盛盛衰衰、消消长长的道路。

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佛教寺院的建设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寺院是佛教最直接的承载体。山东佛教寺院在盛盛衰衰、消消长长的过程中，与全国大多数汉传佛教寺院一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其中，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寺院。

佛教寺院既是供奉佛像、存放佛经、举行佛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僧人们生活、居住的地方，因此，它们的建筑特点既受佛事的影响，也受僧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时，它们还深受山东地区传统建筑工艺、气候、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在总体布局和单体建筑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建筑特点上，齐鲁佛教寺院由于建设年代一般都在南北朝时期以后，那种以佛塔为中心的布局格式几无痕迹可寻，而是深受宫殿、王府、住宅等传统建

筑模式的影响，一般都由一组组的庭院式建筑组成。寺院的等级、规模不同，寺中庭院的数量也不同。规模小、等级低的寺院，一般只有一两个庭院；规模大、等级高的寺院，一般都有四五个以上的庭院。无论寺院大小，一般都由一条中轴线分开，左右对称。规模较大的如灵岩寺，依山就势，沿中轴线布局，左右对称，四周绕以封闭的围墙，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院落。规模较小的如济南千佛山兴国禅寺，共有两个禅院，五座殿堂。所有的寺院，都以大雄宝殿为主体建筑，沿着中轴线，大雄宝殿前面排列山门殿、天王殿，后面则排列法堂、藏经楼、毗卢阁、观音殿，层次分明，布局严谨。

山东佛教寺院的单体建筑和种类较为丰富，殿、堂、楼、阁、廊、庑、亭、台等，凡是齐鲁古代建筑中的诸多类型，在山东佛教寺院中几乎都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建筑物，梁架交错，斗拱支撑、木榫卯接，一般都呈人字形两面坡，屋面上覆青瓦、琉璃瓦或者镏金瓦，屋脊和斗拱上安置着饰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山东地区的佛教寺院，除了具有汉传佛教寺院的共同特点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齐鲁文化，许多佛教寺院也留下了齐鲁文化的烙印。山东地区佛教寺院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山东人崇尚武圣关羽和宋朝时精忠报国的岳飞，在许多佛教寺院中把关羽、岳飞也供奉起来。例

如，莒县定林寺，除了在大雄宝殿中供奉佛祖外，还专门为关羽建造一殿，供奉其神像。其他供奉关公的寺院还有枣庄灵泉保寿禅院、桓台华严寺、枣庄青檀寺等。新泰正觉寺中有关岳合祠，将关羽、岳飞一并供奉。二是山东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尊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同时也尊重道教，在一些寺院中别出心裁地创建三教堂，同时奉供儒、释、道三教，其中最为著名并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这种三教寺是日照莒县的定林寺。在定林寺的后院，建有一处三教寺，殿内同时供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座塑像，这是山东省现存唯一的一处三教寺。另外，据史料记载，历史上这样的寺庙在山东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还有枣庄的灵泉保寿禅院和曲阜的石门寺，这里也都修有“三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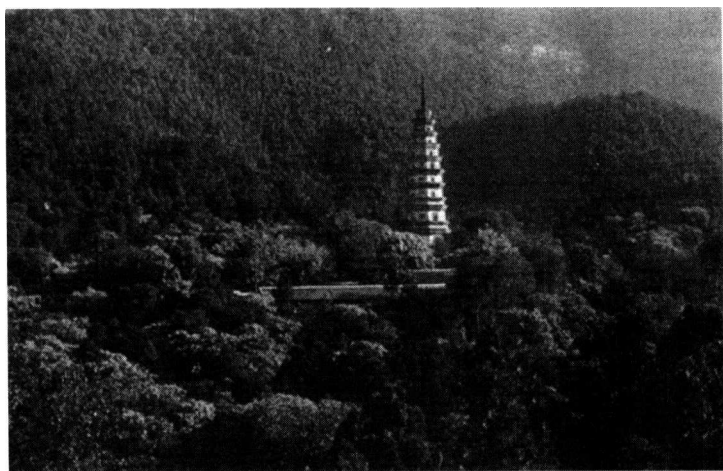
融佛教文化与齐鲁文化于一体的山东寺庙建筑，主要分布在以泰山、济南、淄博为中心的鲁中地区，在鲁西、鲁南、鲁西南、鲁北地区也有大量分布，沿海地区则主要分布在青岛和日照。这些大大小小的寺院，或保存完好，或以遗址形式存在，或经过重新修建面貌一新，但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总是能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精巧的建筑设计、丰富的艺术造型给我们以震撼、以启发。并且这些寺院大都建在自然景色优美、环境清幽之处，建筑与自然的完美融合，使山东的这些名寺所在地大都成了现在人们观光旅游的著名景点。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青山绿水中的座座寺院，体验一下齐鲁名寺的风采吧。

济南灵岩寺

被称为我国佛教禅宗名刹之一的灵岩寺，位于泰山西北麓长清县的一个东西长约 10 公里、南北宽约 5 公里的山谷中，这里四周峰峦叠嶂，泉溪淙淙，景色秀美。它坐北朝南，背依之山方正如一枚印章，因此古代称之为“方山”，又叫玉符山。其东有棋子岭、灵辟峰、朗公山，南有如来顶、明孔山，西有鸡鸣山、塔宝峪。相传前秦苻坚永兴年间（357—358），高僧朗公来此说法，猛兽归伏，乱石点头，故称灵岩，并建寺为灵岩寺。至今，灵岩寺东郎公山上还有一块石头，状若老僧，拱揖而立，俗称“郎公石”，传说即为当年“石为之点头”之石。

灵岩寺的再一次开山是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初年（520）开山祖师是法定和尚。据记载，法定和尚“先建寺于方山之阴，曰神宝；后建寺于方山之阳，曰灵岩。”历史上记载，法定和尚在现在灵岩寺的西北山岭之阴先建的神宝寺，这里有神宝泉；后建的灵



环境幽雅的灵岩寺

岩寺在现在灵岩寺东北的甘露泉附近。在这个时期，灵岩寺虽然已有一定的规模和知名度，但相比较而言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还比较小，影响范围也还只限于周边地区。

灵岩寺的兴盛是在唐代。唐代贞观年间，高僧慧崇将灵岩寺迁到方山的西南麓，也就是现在灵岩寺所在的位置，大兴土木，建造寺庙殿阁，才开始形成规模，最兴盛的时期殿阁多达 40 多处，禅房 500 多间，僧侣 500 多人。灵岩寺在这个时期不但规模空前，而且由于著名高僧和皇帝的光临，使其声名大震，也因此奠定了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灵岩志》记述，唐贞观初年，著名僧人唐玄奘曾慕名住在灵岩寺翻译过经文。当时的皇帝来泰山封禅、